

《香港造城记》作者的又一力作!

第2版

向日本城市学习

城市设计向东看

【澳】 Barrie Shelton 著

曾琦欣 译



中国工信出版集团

電子工業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OF ELECTRONICS INDUSTRY
<http://www.phei.com.cn>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本书由华侨大学外国语学院
校友基金资助出版

向日本城市学习

城市设计向东看

(第2版)

【澳】 Barrie Shelton 著
曾琦欣 译



電子工業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of Electronics Industry
北京 • BEIJING

Learning from the Japanese City: Looking East in Urban Design (Second Edition)

978-0-415-55440-4

Barrie Shelton

© 2012 Barrie Shelton

All Rights Reserved. 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the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Routledge, a member of the Taylor & Francis Group. Publishing House of Electronics Industry is authorized to publish and distribute exclusively the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language edition. This edition is authorized for sale throughout Mainland of China. No part of the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Copies of this book sold without a Taylor & Francis sticker on the cover are unauthorized and illegal.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本书原版由Taylor & Francis Group出版集团旗下的Routledge出版公司出版, 并经其授权翻译出版。中文简体翻译版授权由电子工业出版社独家出版, 并限定在中国大陆地区销售。未经出版者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发行本书的任何部分。本书封面贴有Taylor & Francis公司防伪标签, 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版权贸易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5-757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向日本城市学习: 城市设计向东看: 第2版 / (澳) 巴里·谢尔顿(Barrie Shelton)著; 曾琦欣译.
— 北京: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6.9

书名原文: Learning from the Japanese City: Looking East in Urban Design (second edition)

ISBN 978-7-121-29366-5

I. ①向… II. ①巴… ②曾… III. ①城市建筑—建筑设计—研究—日本 IV. ①TU984.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57837号

策划编辑: 胡先福

责任编辑: 胡先福

印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装订: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电子工业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173信箱 邮编 100036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12.25 字数: 236千字

版次: 2016年9月第1版

印次: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

定价: 48.00元

凡所购买电子工业出版社图书有缺损问题, 请向购买书店调换。若书店售缺,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 联系及邮购电话: (010) 88254888, 88258888。

质量投诉请发邮件至zltz@phei.com.cn, 盗版侵权举报请发邮件至dbqq@phei.com.cn。

本书咨询联系方式: 电话(010) 88254201; 信箱hxf@phei.com.cn; QQ158850714; AA书友会QQ群118911708; 微信号Architecture-Art

第2版 自序

公元607年^①，日本摄政王圣德太子捎了一封信给中国的隋炀帝。信中，他自称“日出之国之太子”，称隋炀帝为“日落之国之皇帝”。此称呼和地理位置有关，看日出须身处西边，观日落须身处东边；西和东刚好是中国和日本的位置。此信暗指两国地位平等（西向东看，反之亦然）或日本地位更高（若日落指“沉沦”或“灭亡”之意）。隋炀帝认为这是对其世界之巅地位及中国优势文化的蔑视，极为愤怒。当时，有文化的日本人口头说本族语，书面使用汉文（kanbun）。该信以汉文书写。

此信反映了两个事实：一是中日两国关系紧张，二是日本文化从古至今融合了许多中国元素。事实上，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影响深远。中国文化的诸多方面被日本文化采用或改良，很多时候与日本本土文化并存。本书第1版对这一现象有明确说明。

例如，源于中国的佛教和日本的神道教互惠互利、共生并存已有1000多年。日语也杂糅了日、中两种语言，同一汉字在日语中有训读（kun，日语音）和音读（on，汉语音）两种发音。日语书面语也是汉字（kanji，源自中国）和假名（kana，源于日本）的混合。实际上，相关例子不胜枚举。日本从中国所借之物，以及它们与日本本土元素的相互关系，有助于读者理解日本人对空间和设计的态度，为本书研究日本城市化及其建筑形式的过去和现在提供了重要背景。

此外，第1版的最后部分指出，日本的许多空间思维和实践不同于受古希腊罗马文明影响的西方国家。早期有学者对比了日语和字母语言书写的空间及视觉特征。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以下观点得以印证：日本特别注重“区块”思维，而西方思维倾向“线性”（Shelton, 2004, Shelton and Okayama, 2006）。事实上，这种差异随处可见，小到零售商品识别—价格条形码的设计，大到规划、辨识城市地块和建筑的空间构架。日本发明的QR码（快速响应矩阵码）呈“回”字结构，而西方国家的条形码包含长短不一的线条。日本门牌散落于“町”（machi或cho）的区域中，而西方门牌沿街道线性排列，便于按顺序找到地块和建筑。（machi和cho是源于日语的训读和源于中文的音读。）

① 原文为1607年，应为607年，中国隋朝时期，疑为笔误。——译者注

第1版还指出，许多日本的空间思维方式和实践历史悠久。尽管它们与西方传统的空间思维方式和实践相矛盾，但其出现却早于（通常起源于西方的）现代哲学、科学和设计的理论立场，并与之一致。日本传统建筑的某些特征（模块化结构、室内空间自由拆分、室内外空间连续等），早于西方现代主义设计师的空间概念。在西方文化中，设计师们为了追求完美设计，往往通过“大综合”的方式整合各种知识，因此更加注重对普世理论的追求。然而，日本设计师不一定整合各种知识，而是并置或联结各个部分，以“并存”的形式将之“综合”起来。

文化、建筑形式和城市三者间的相互影响依旧是本书的重点。希列尔（1996）、马歇尔（2005）、萨林加罗斯（2005）等评论家在其近作中探讨了城市的结构、形态及相互关系。得益于此，本修订版新增了一个部分，从城市和区域层次上对实地进行了具体的描述和分析。这些重点的转移和话题的延伸促使了本书副书名的改变，由第1版的“城市设计东西交汇”（侧重从观念上理解日本城市、空间和设计文化）调整为“城市设计向东看”（侧重研究“范本”的具体形式及其启示）。

本次修订涉及了许多大小不一的变化。例如，对丹下健三的后现代主义建筑——东京都市政厅的讨论，其重要性相比十年前已有所削弱，本版予以删除。许多信息和说明更加完善，一些错误得以订正。全书有200多幅图表，一半以上为本版首次使用。此外，本版最大的变化是新增了最后一章（第6章：非凡御器所），聚焦号称日本第三大城市（也是日本最宜居和便利的都市）——名古屋的一个小区域，探索了这一普通超级街区的非凡之处，展示了许多原本零散于书中各章节的城市元素和特征。通过列举这一普通街区，体现极具日本特色的城市综合模式，提供设计范本、揭示设计理论，为本书做了务实有效的结尾。

澳大利亚墨尔本

2012年2月

注 释：

- 1. 事件发生时间以公认的日本历史时代划分为依据，读者可参考附录 I。
- 2. 全书使用了一些日语词汇，读者可参见附录 II 的日语词汇表。

第1版 自序

西方对日本城市形态鲜有正面评价。对粗略了解日本设计历史的人们而言,许多现代日本建筑和城市结构自相矛盾且过度张扬,与其精致内敛的设计传统相悖,令人匪夷所思。几年前,《今日建筑》前主编皮埃尔·瓦戈在题为《远东受惊记》的文章中表达了对日本近期建筑和城市特征的失望和不安,说其严重背离传统(Vago, 1992, p. 81)。他的观点(在西方)很具代表性。然而,从他的语气中可以发现,他对日本人并非吝啬,对其城市和建筑发展情况也并不陌生。事实上,正是出于惶恐和不安,他决定到访日本。

最近几年,评论家们尽管对日本城市外观仍然持批判态度,但也赞叹其活力、效率和技术水平。当然,要了解日本城市的这些特点,不能远观,只能近看。

我对瓦戈的看法感同身受,因为我必须承认,当时若非被挚友说服,我也非常不愿意去日本。当我最终踏足日本各个城市时,所见所闻令我极其困惑、烦恼甚至害怕。然而,我也惊觉自己因为这些见闻而充满热情、容光焕发,并深受启迪。我摆脱各种束缚,很快意识到探索日本城市杂乱中的活力可能会带来极大的收获。

当时(1989年),我从事城市规划已有二十余载,精通西方城市设计历史,理论基础也颇为扎实。过去几年,我在城市设计比赛中也屡获佳绩,其原因是我的参赛作品运用了久经考验的西方模式(界限分明的公共空间、建筑的有序排列等)来整合目标地块。然而,当我试图了解日本城市形态时,却发现自己的知识和经验不但毫无帮助(例如,能为批判性评价提供根据),反而成了阻碍(由于头脑中既定、僵化的优秀城市形态概念)。许多在我文化范畴内备受珍视的城市形态观念在日本似乎无关紧要。

的确,正是我所重视的西方城市设计观念和远东所见之间的差异使我对日本城市产生了经久不衰的兴趣。约十年前,我首次到访日本时,就开始思考以下问题,这些问题也成为本书的主要内容:

日本城市为何展现如此形态?

日本城市和更宽泛的当代城市设计有何关系?

今天我在日本所见与其城市设计传统有多大差异?

之后，我无数次地回到日本，并徒步至所到城市尽可能多的角落：巷子、神社和寺庙周围、公路、火车站（及周围“磁”场）、屋顶、观景台、拱廊、地下街道、酒吧、庭园等。我还参观了许多住宅，包括历史上商人和武士住宅。总之，我试图从不同角度观察审视这些城市，从最污七八糟到最高雅时尚的区域，包括开有名牌店的地方。除了实地考察，我还经常爱不释手地研究新旧城市地图、博物馆展出模型、老照片、明信片等。此外，我与城市研究者和设计师们进行了多次讨论，并查阅了国内外许多书籍和论文。

然而，我也深知，研究日本城市，我至少有两大局限。一是我尚未走遍日本城市，从九州岛的熊本和长崎往东北到东京地区，路程不超过东海道新干线（子弹头列车）的往返运行距离。不过，所到之处倒是包括了日本历史上的重要区域——大和地区。此外，我的日语知识贫乏，只能通过翻译版本或日本友人查阅日语资料。对于日语，我关注的是书面和印刷文本的视觉特征；要读懂意思，大多数时候我只能依赖他人。

这一期间，本书内容一直在累积成形，但材料的收集主要是过去三四年完成的。通过观察、阅读、讨论建筑和城市空间，以及涉猎有助于了解城市设计的其他文化（例如，日语文字和地图绘制特点，神道教、佛教及两者的并存），本书得出了初步结论。换言之，本书涵盖范围广，能够解答前面所提的中心问题。

第1章是全书的背景，回顾了西方对日本城市形态不断变化的态度。第2章探讨了日本和西方截然不同的空间思维方式，体现在一系列视觉现象和比例设置中，小到纸张书写，大到城市规划。第3章是全书篇幅最大的章节，介绍了大量日本城市特征和新旧建筑类型，包括作为城市节点、历史上连接武士和商人住宅区的桥梁及周围区域，当代建筑类型等，有利于深入了解今天的日本城市。第4章从宗教和其他文化汲取了影响城市形态和空间的因素。最后一章（第5章）整理全书脉络，指出许多日本城市设计传统和当代思维的一致性。

为了避免透露后面章节太多的内容，我提出贯穿全书的三条概念脉络，以回应之前提出的问题。一是日本城市形态背后的思维方式根源于日本文化，和西方截然不同。例如，日本人喜欢“区块”概念【这解释了榻榻米（tatami）、建筑地板和“町”作为城市里区域组成单位的重要性】；相比而言，西方文化更注重“线性”（更强调诸如建筑墙体等线性结构，以及沿街建筑的顺序排列），这是日本和西方空间思维的根本差异。

第二条脉络是日本城市尽管拥有现代性外观，却扎根于悠久的文化传统。的确，有些城市外观看似和传统格格不入，但其根基却是古老的观念和价值。例如，日本的城市空间构成更强调内容（信息、活动和动画），而西方则更注重形式（物体、外观形态和美学构成）。今天的日本城市，你会看到大量招牌、灯光和动画覆盖整栋建筑甚至整个区域。这些景象违背了西方审美观，被认为纯粹是20世纪商业化的产物。事实上，这一观点忽视了以下事实：挂满招牌的建筑在日本由来已久，钢制招牌、霓虹灯和电子动画只是补充或取代了随风飘展的招幌、充气广告牌、转动的旗帘。因此，尽管日本城市较之以前有明显不同，两者却保持着惊人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体现在本质而非形式或材料上。

第三条脉络是相比西方城市，日本城市的许多特征尽管根源于本国文化和历史，却与起源于西方的现代科学、哲学思想关系更为紧密，颇具讽刺意味。西方现代科学、哲学思想主张断裂、转化、局部独立和非线性特征。正是基于这些观点，貌似混乱却灵活有序的日本城市在当今不确定的多元世界里崭露头角，成为职业设计师和文化爱好者学习的对象和灵感的来源。

澳大利亚霍巴特

1998年12月

注 释：

我设定大部分读者熟悉我所讨论的西方景观和物体。由于日本是本书关注的重点，因此，在进行城市对比时，我对西方实例一掠而过，提供的插图也很少。例如，书中只提到埃菲尔铁塔和贝利尼画作的名称，却附有东京铁塔的图片和歌川广重的版画。书中谈到的西方景观和物体若提供插图，它们通常位于较不知名的地方，如我的家乡诺丁汉郡或我居住的澳大利亚。

第2版 致 谢

20世纪90年代末，准备本书第1版是项艰巨的任务，我得到了许多人的启发和帮助。同事、朋友贡献了许多想法、材料及其他帮助，对此我深表感谢。第1版致谢经略微删减，将置于本致谢后。本书内容自出版以来之所以能得到修改和补充，实要感谢在此过程中给予帮助和建议的人们。

首先，我要感谢我的妻子冈山惠美子博士，她一直是我最重要的建议和灵感来源。她在语言、视觉艺术、文学及相关理论上对东亚和西方的认识，以及翻译和书法技巧，总能让我感到惊奇，对我帮助很大。我们有共同的兴趣、相互扶持，有时会合作论文或共同承担项目。为我提供照片或其他支持的家人还有：岩野文彦、岩野和代、冈山雅史以及我的儿子榎·谢尔顿。

我在名古屋大学担任过一段时间的客座教授。期间，我得以获取数据、进行实地考察，并和建筑系的片木笃教授和堀田典裕博士共事，他们向我介绍了新的资料来源和考察地。此外，我还有幸认识了颇具影响力的林良嗣教授。

我还必须感谢出口敦教授（现任职东京大学）和九州大学的蓝谷钢一郎。他们对日本建筑形式和福冈市展开讨论，提供相关信息，邀请我参观九州大学，对我的实地研究提供便利，我对此不甚感激。

在合作《香港造城记：从垂直之城到立体之城》（Routledge，2011；中文译本由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的过程中，我和同事汤姆·科万教授和贾斯蒂那·卡拉奇威茨副教授的交谈所得，在本书中也有所体现。

在撰写本书第1版时，我并不认识汤姆·海内肯教授（现就职于东京艺术大学），他所著的本书评介发表于《建筑评论》。巧合的是，三年后我们在悉尼大学共事，并成为挚友。我们讨论的许多内容启发了本版的问世。此外，妮娜·曼德博士（现于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任教）在悉尼大学读博期间，我从和她的交谈中得到不少见解。同样在悉尼，两位城市设计专业的研究生休奇·尼科尔森和马德汗·谢卡尔在分析和绘图上给予我很大帮助。

2010年，我调到墨尔本大学。该校的建筑、建造及规划学院出版专项经费协助我完成了本书的最后准备工作。在此期间，艾琳·吴（Aileen Goh）担任我的研究和绘图助理，非常热心、高效。

李丹（Li Dan）先后在悉尼大学读研、九州大学读博，墨尔本大学任助

研兼助教。期间，她对我的项目表现了浓厚的兴趣，并协助我进行实地考察。她思维敏捷，熟悉中国和日本，掌握三门语言，绘图技巧娴熟且精力充沛，对本版的问世起了很大作用。

最后，我还要感谢都筑雅子和她的母亲，她们是名古屋御器所街区（第6章的主要内容）的老居民。她们向我描述了亲身经历，并回忆了社区发生的许多往事。

这一修订补充版《向日本城市学习》得益于以上提及的各位以及悉尼大学、墨尔本大学的许多学生，他们提出的问题和意见使我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

最后，联系版权持有者，确认本书材料来源耗费了大量精力。本人和出版商希望在此或书中感谢允许本书使用版权信息的组织和个人。当然，若有任何错误或疏忽，我们将在以后的印刷中纠正。

巴里·谢尔顿

墨尔本大学

2012年2月

第1版 致 谢

任何重大项目的完成都需要许多外力协助，本书也不例外。我需要感谢的组织和个人不胜枚举，但有些需要特别致谢。

首先，要感谢我的妻子冈山惠美子。没有她，我可能不会接触这一话题；没有她的支持，我也许没法坚持到底。她的母语能力不仅为我提供翻译帮助，还使我接触到许多日语文本和日本友人，让我受益匪浅；另外，感谢她在书法上对本书的贡献。此外，我们的儿子赫伯特·慎能够在两种文化习惯中自由转换，给了我许多灵感。

非常感谢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在项目最紧张的4个月里给予的支持（我是该基金会会员）。那期间，我在长崎综合科学大学建筑系工作，林一马教授及其同事热心推荐了宝贵的资源和相关地方。片寄俊秀和日比野雅美教授向我介绍了长崎的方方面面，给我鼓励和支持，对此我深表感谢。

我还要对冈山一家表达谢意。他们腾出一个房间作我的办公室兼资料室，还提供了许多有用器材和设施。

非常感谢东京法政大学建筑系的阵内秀信教授，是他帮助我发现了东京许多不起眼的角落，并深刻了解该城市的历史。尽管我和芦原义信教授见面已经是1989年的事，但那次长谈激发了我对此话题的兴趣，并对我是否着手这一项目产生很大影响。两位教授的著作也令我受益匪浅。此外，还有三位未曾谋面的人士：建筑评论家波同德·伯格纳，建筑师、理论家槇文彦，以及作家、记者彼得·波凡姆，我拜读了他们大量的著作（见过槇文彦设计的建筑），信息量大，见解精辟，使我深受启发。

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即使日本人要在其城市里找到某些地方也困难、费时。对我而言，很多人给予帮助，使得我的研究既愉悦又富有成效。有些人听闻我的话题，带我参观了他们城市和地区的相关地方。已故的大久保博纪和他的妻子贞子，毫无保留地向我介绍了福冈特别的地方和人物。中岛直子、伏岛美荣和查德·温揭秘了大阪及整个关西地区一些鲜为人知的角落。值得感谢的人还包括：佐野真由子协助我获取资料并给予建议。几位长崎和福冈的政府工作人员，特别是五所研吾和井上隆司，帮助我进行实地考察，获得相关信息，更深入地“观察”这两座城市。东京都立大学的小林克弘加深了我对某些东京建筑的了解。福冈读卖专门学校的平岛道幸增进了我

对日本传统排房的认识。

我还要感谢塔斯马尼亚大学几位同事对这个项目的兴趣和帮助。理查德·布莱思、朱利安·迪伦、特里·洛班、佩特林娜·莫尔、吉尔·罗伯茨、已故的罗里·斯宾思、利·伍利和朱剑飞（现为墨尔本大学的同事）在摄影、计算机、绘图、管理和“思想”上提供了重要帮助。此外，塔斯马尼亚大学资助了我的短期进修假，使得本书出版方案得以初步成形；本书即将出版的最后阶段也得到该校的帮助（当时我已离开该校全职岗位，被委任为名誉副研究员）。

感谢牛津亚历山大出版社的安·拉德金。作为出版商代表，她敏锐的判断和乐观的心态使我的研究朝正确方向进展，并基本按时完成。还要特别感谢冈本三木在紧急关头提供的材料。值得感谢的还有：凯文·纽特促成了建设性的讨论，斯蒂芬·哈姆尼特教授（南澳大学）和通·阮（Thong Nguyen）教授（当时任职塔斯马尼亚大学）在我需要支持时表达了对我和项目的信任，图书管理员雅基·皮卡德鼓励并帮助我拓宽阅读面，并锲而不舍地完成项目研究。

目 录

第2版 自 序	v
第1版 自 序	vii
第2版 致 谢	xi
第1版 致 谢	xiii
第1章 西方对日本城市的兴趣	1
第2章 区块与线条：从文字书写到城市布局	16
书写和印刷文本	17
建 筑	23
城 市	31
城市地图	42
时间、拼合之景和线性空间	48
第3章 形态各方面：街道及相关场景	52
传统城市划分	53
街道、招牌和建筑交通空间	67
街道、人行道和桥梁	77
向下沉落且横向延伸，地处外围却实为中心	97
本章后记：江户东京博物馆	110
第4章 几缕文化线索	112
神道教和城市景观	112
佛教与建筑形式	115
并存与叠加	118
文本与城镇（第2章回顾）	120
城市与乡村、公共与私有	122
第5章 向日本城市学习	125
第6章 超级街区之综合：“非凡御器所”	138
一座典型、便利的城市	139
典型城市里的便利之地	149
总 结	168
附录 I 日本历史时代（划分）	169
附录 II 日语词汇表	170
参考文献	174

第1章

西方对日本城市的兴趣

1543年，欧洲人首次踏上日本土地。但仅在96年后（1639年），他们就几乎完全被阻挡在日本国门之外。在接下来的两个半世纪里（1854年前），欧洲和日本的接触主要是通过居住在长崎港一个人工小岛上的若干荷兰人。

在刚接触的短暂时间里（由于当时船只往返欧洲和日本一趟需要两年甚至更长时间），稀疏往来的欧洲人（主要是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意大利人、英国人和荷兰人）在岛屿边缘从事贸易、传教和教育活动。他们发现日本人口密集、居住范围广、城镇众多。16世纪末，英国人口450万，西班牙人口800万，而日本人口约为1800万，称得上是人口大国。低地地区人口密度之大，让来访者大为吃惊。1609年，墨西哥出生的西班牙人罗德里格·维维罗造访日本，他指出，在首都（今天的京都）和骏河（静冈）间400多公

里的范围内，“你找不到一公里荒芜人烟之地”（Cooper, 1965, p. 282）。欧洲和日本城市的规模经常被相互比较。1613年，英国人约翰·萨利斯认为骏河“有伦敦及其郊区的大小”，大阪“等同于墙内伦敦的规模”（同上，pp. 287和288）。罗德里格·维维罗也有理有据地写道，“在这已知的世界里，没有比京都更大的地方了”（同上，p. 280）。

此外，到访者对当时的城市和建筑饶有兴趣，甚至赞赏有加。他们对大城堡，特别是大阪的大城堡肃然起敬，赞叹首都棋盘式的街道布局和宽阔的马路，也注意到大规模的佛教寺庙及其供奉的神像。然而，值得一提的是，首都和寺庙都是文化输入的产物，本质上与其说是日本的，不如说是中国的。京都模仿当时中国的首都长安城兴建，无论在当时或现在的日本都独具特色。城堡虽由日本设计和建造，但规模受来自欧洲的火器使用之影响，与欧洲碉堡相比，外观上有些类似，规模上更甚，同时又增添了几分异域风情。

事实上，日本城市的许多本土特色也在到访者中引起反响。其中之一就是武士阶层居住区域（带有庭园的住宅）和商人、手工业者居住区域（房屋沿街排列）明确分隔，后者区域又根据行业的不同进一步划分，各区设有大门。另一个经常受到关注的特点是房屋多为单层结构，具有独立性（很多虽然排列成行，但仍相隔而立）。木结构建筑防火性差，但移动性强，这给来访者留下深刻印象。许多人亲眼目睹整个城区被毁，房子被搬到新址的过程。尽管当时欧洲城市也受自然灾害和火灾影响，但比较而言，它们更牢固持久。由于许多欧洲城市的卫生状况骇人听闻，因此日本城市的整洁干净（街道、建筑及居民都整洁干净）成为被普遍比较的方面也就不足为奇了。此外，有些城市（包括大阪在内）的桥梁数量、质量也颇受好评。罗德里格·维维罗再次发表了独到的见解（之后将收集整理），“西班牙的住宅（或许他指的是位于墨西哥的西班牙式建筑，这样他的评论才更有意义）从外观上看更好些，但日本房屋的内部漂亮许多”（同上，p. 294）。

在刚开始接触的一个世纪里，欧洲对日本城市基本上是正面的描述。礼仪、服装、习俗、节日、艺术、语言、甚至建筑（特别是贵族阶层的住宅）等文化也引起欧洲极大的兴趣。一方面，许多城市特征得到关注和好评；另一方面，这些特征和日本的大部分东西一样，被视为与欧洲截然不同。意大利耶稣会会士范礼安也是一位观察敏锐的到访者。他写道：“日本是和欧洲相反的世界；一切都那么与众不同，和我们没有任何相似之处。”随后，他

又补充道,“如果他们野蛮粗鲁,那倒不足为奇,但令我吃惊的是,他们谨慎行事、文明待人……”(同上, p. 229)欧洲人以宽容之心观察日本文化和城市。日本城市或许没有被奉为城市文明的表率,但也未被贬低,也不拥有许多值得敬佩的元素。在欧洲人的印象里,它们独树一帜,却在某种意义上和欧洲城市相媲美。

日本闭关锁国期间,商人阶层迅速膨胀,城镇也随之快速发展。18世纪,江户(今东京)已经跃为世界最大城市,远远超越欧洲最大的伦敦和巴黎。因此,日本在19世纪50年代重新开放时,映入西方人眼帘的是更多规模更大、人口更密集的城市。更多西方人来到日本,美国人(美国到日本的海上行程相对较短)也首次抵达。这一批来自大西洋两岸(及其他地方)的西方访客,大多对日本城市及其建筑形式相当挑剔。在19世纪下半叶“开明”的西方人眼里,这些城市单调乏味、平淡无奇、脆而不坚。

反思西方在日本锁国前和重新开放后对江户—东京(江户于1868年更名为东京)态度上的变化,德国日本研究所所长约瑟夫·克雷纳认为,早期到达江户的欧洲人发现这座城市“某种程度上与欧洲城市并驾齐驱”,因此也容易亲近理解。直到欧洲启蒙运动后,这种态度才发生了变化。事实上,引起这种变化的不是日本的改变,而是欧洲人自我意识的变化(Kreiner, 1995, p. 166)。

19世纪末和20世纪很长时间里,西方人几乎毫无例外地只看到日本建筑的脆弱和城市的乏味。1903年,道格拉斯·斯莱登报道说,“许多日本房屋晚上关门后,几乎承载不了醉汉的倚墙之力”(Sladen, 1903, p. 2)。约往前20年,精力充沛的伊莎贝拉·伯德把东京描述成“并不壮观的‘远方之城’”,意指东京是在望不到边的城市地平面上,由灰暗、无奇的区块随意组合而成的(Bird, 转引自Yapp, 1983, p. 612)。斯莱登还认为京都日本“文化皇冠”上的宝石,“和格拉斯哥一样,适合远足郊游(我因此推测京都也阴郁凄凉)”(Sladen, 1903, p. 388)。当时的西方人游历日本城市都是虎头蛇尾,W·E·格理菲思也是如此。一瞥福井之后,他就评论道,“这里缺少西方世界里能立刻夺人眼球的结构,如装有镀金风向标的尖塔、巨大的三角眉饰、立面、宏伟的建筑等”(Griffis, 1876, p. 423)。欧洲人、甚至美国人心目中的日本城市就是毫无特色的临时之城,这很大程度上也是西方质疑日本建筑和城镇的主要原因。

拉夫卡迪奥·赫恩移居日本,以日本为家。他经常津津乐道于这个国家

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赞同纳妾制。但是，就连他对日本城市的整体结构也持保留意见。对于他钟爱的松江市，他的评论充其量是深情的描写（Hearn, 1894 [1976], pp. 139-171），而熊本市，他认为该城极其丑陋。（Francis King转引自Hearn, 1894 [1976], p. 13）。另一位亲日人士是美国人爱德华·S·莫尔斯。他致力于记录并向海外传播日本传统文化；在日本国内，当西方文化蜂拥而至时，他也极力捍卫日本文化。1877—1880年担任东京大学动物学教授期间，他完成了关于日本民用建筑的第一本权威著作。在书中，他精心描述了日本住宅及其周边环境，并对之进行分类。然而，他也承认日本房屋外观简陋，颜色单调，乍一看令人非常沮丧。这些建筑（民宅和商业建筑）形成“灰色住所的海洋”，产生了“灰暗效应”和“整体单调感”。他总结道，“鸟瞰一座城市，我们就了解了其建筑的全貌，建筑间的细微差异主要源于它们所处位置的不同”（Morse, 1876[1972], pp. 1-6）。

总体看来，西方人不愿意承认日本所见之价值，更不愿意虚心学习。相反，他们以设计倡导者的身份自居，专业人士热切希望把新的建筑和城市秩序强加给自己认为更原始的地方。的确，西方和日本的建筑师们在日本各地修建了许多西式建筑。公平地说，用“强加”来形容明治时代（1867—1912）西方建筑形式在日本的推广有些误导性，因为日本人本身就热衷于在所有方面“赶上”西方：金融、交通、制造业、技术、通信和文化等。为了实现西化，大学和政府部门从欧洲（主要是英国、德国和法国）和美国引进了一大批有前途的年轻人，建筑设计和规划领域也不例外。

日本建筑的品质和特色在锁国时代结束80多年后才得到西方的高度集体赞赏。主要拥护者是当今被视为现代主义建筑先驱人物的几位开明建筑师。他们（包括弗兰克·劳埃德·赖特、布朗诺·陶特和沃尔特·格罗皮乌斯）在传统日本建筑中发现了自身试图恪守或融入作品的设计原则和特征，因此对其评价很高。相较而言，日本城市等待的时间更长，直到今天才开始得到西方的认可。

首先获得西方人、专业设计师和游客一致称赞的城市景观是日本的庭园。年轻的英国人约瑟夫·康德，与莫尔斯同辈，时任东京大学工程系建筑学第一讲师。通过一系列政府、宗教和机构建筑的设计，他在日本推行西方的建筑风格。此外，他的出版物使日本庭园获得广泛关注，贡献堪比莫尔斯对日本房屋之作用。1893年，他也完成了一本关于日本庭园历史、类别、构成及细节的著作（《日本庭园入门》）。然而，他在书中并未表现莫尔斯对日